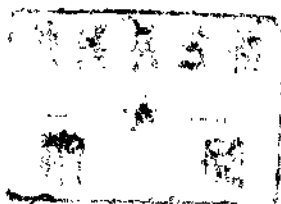


21. 05

纳溪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89

纳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纳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六辑

198204/42

纳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三到合面——忆白区地下战斗生活·····	张耀龙 (1)
四川省会警察局起义前后·····	赵斐亚 (10)
国民党学兵总队简介·····	龙政举 (28)
纳溪“特科班”考核轶事·····	任文渊 (35)
纳溪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梁寿文 (38)
· 回顾纳溪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单耀斌 (49)
纳溪县建置沿革·····	孙东行 (57)
打古乡掌故·····	赵熟樵 (62)
和丰乡走进荧屏·····	冯和图 (69)
乐登乡的建置沿革和特点·····	范宜荪 (73)
万人空巷送君归·····	曹杰秋 陶长清 (81)
深切怀念唐凤宝烈士·····	谢会盟 (89)
冀北胸襟 纳溪扎根·····	曹杰秋 (95)
江岸塔影与白塔朝霞·····	马中一 (103)
利合场新发现的石碑·····	张志钦 (105)
孙春庭抢乐道场·····	范宜荪 (108)
几家有趣的吃年夜饭·····	冯和图 (111)

三 到 合 面

——忆白区地下战斗生活

张耀龙

我生长的故乡是贵州省赤水县大桐区一碗水，位于川黔边境，紧靠红军长征经过的老林区。一九三五年余泽鸿率领红军川南游击队在这里同敌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较大，抗日战争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我在也此时投身到革命怀抱，开始了革命生涯。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安排我三次到纳溪合面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一九四三年秋，党组织交给我一个任务，去惩办一个姓罗的叛徒，我老在林区将叛徒处决后，不慎留下线索，被敌人逮捕，但我的政治目的没暴露。经过党组织多方面营救，经统战关系去说情，才由家里出钱买放出来，于是，组织上通知我立即转移。

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纳溪合面铺。交关系给我的是叙（永）、藺（古藺）、宋（古宋）三县特委的联络员韩子健，他交给我一个联络点和联络暗号，并描述了接头人的相貌。我到合面铺后很顺利就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在线上以行医为掩护的吴恩浦。晚上我住在他家里，他简单地给我讲了合面的情况，接着又告诉我，他已托新屋基的黎有章与我找职业，以便掩护下来。不久，我便到黎有章家教私塾，后来黎有章又通过大庙乡第六保保长朱禹明的关系，介绍我到保国民小学去教书。

保国民小学设在热水田的一个破庙宇里，利用破败了的庙宇作教室，年久失修，破破烂烂，设备也很简陋。这个学校过去是朱禹明的弟弟朱老四在这里教书，由于教得不好，只有十来个学生。我来这里教书后，注意尽力把学生教好，使学生受益，使家长满意；同时，借介绍学生学习情况到学生家里访问。我这个教书先生不摆架子，学生和家长都欢迎我去，渐渐和周围的群众混熟了。我最常去的是黎汝霖家和周树清家，同他们谈家常，谈庄稼，谈粮食收成，谈社会现状，激起了大家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极端不满。于是，我因势利导，谈到共产党上面来。在当时，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自己是共产党，而是说听别人谈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们将来想把国家变得如何好，不受帝国主义欺负，老百姓过的是平等、自由、富裕的日子。他们听后很向往。和群众接触中，了解到他们的许多疾苦：如农村的农民和泥木石匠等，都没有文化，常常去跟地主租佃要写佃约，向富户、地主借钱、借粮要写借据，打官司要写呈文，以及冠婚丧祭要写对子、团书、拜书、礼书、祭文等等，都要花很多钱去请人写，我知道后，就帮他们写，有求必应，不索报酬，这一来，我同群众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我到场上去进茶馆，有人争着开茶钱，进酒馆，有人主动端酒来，让我坐上席。当然我不是为了图吃，而是体现了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来。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搬到距我校不远的荷包丘周树清家去住，他们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喝的茶是将老茶叶子用罐子在柴灶上煨的，又烟又苦涩，没有烟抽，就用老菜叶子当烟抽。白天教书后，还要四方奔走做工作。晚上睡的床是

挨着牛棚的，每当给牛熏蚊子时，熏得我眼泪水长流，气都喘不过来。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可是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信心。记得我当时曾写下这样两首诗：

看 明 天

其 一

黄昏读罢歇桑田，把酒吟诗醉欲眠。回到溪流更唱五，
伫将醒眼看明天。

其 二

拂晓观天意外晴，泥人夜漏补冬更。披星戴月毫无怨，
偷得仓箱乐太平。

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在任何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都要坚持斗争。我家里是地主，母亲拿三石、两石谷子卖了，把钱拿给我，我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教书得到的一部份钱也拿出来交给党。搞单线联络，到五通、宝源、富顺、泸州到处去跑，都是自己掏钱。那时在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可能，为了党，献出生命都在所不惜，那里还会计较什么个人得失。

在热水田教书期间，我发展了黎有章入党，本来早在一九三九年，吴恩浦就准备吸收他入党，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上级通知暂停发展，而没有被吸收。以后多年他一直表现得很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黎有章入党后，为我们的组织增添了骨干力量。

我在热水田教了两学期的书后，又回到新屋基黎有章家星教私塾。当时抗日战争已取得胜利，时局起了新的变化，

我们的工作需要迅速开展起来，由黎有章出面来团学，我表面是他请的教书先生，住在他家里，既便于掩护，又便于配合工作。这时我教的学生增多，达到七十余人，合面场一些有名望的人士都将子弟送来读书。我一个人负担不下，就回到赤水去联系了一个女同志邹正淑来共同教。邹正淑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赤水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的。这期间，黎汝楫、杜志芳等几个进步青年常和我们接触，借了一些进步书刊去看，如《大众哲学》《社会新经济学》、《新华日报》等，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很容易接受。杜志芳和我的爱人、妹子等几个妇女组成了读书小组，我一边教他们学文化，一边也讲些革命道理。一九四五年我就介绍了黎汝楫和杜志芳入党。当时我们几个党员没有成立小组或支部，是进行单线联系。我的上级联络人是韩子健，有时也和吴恩浦联系，黎有章和邹正淑他们由我分别单独联系。韩子健调走后，我由廖林生直接联系，不久黎有章也调到赤水去了。廖林生常来合面，住在新屋基，给我们布置工作。新屋基是我们活动和联络的地点，周围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工作渐渐开展起来。

一九四六年，我在合面的活动被敌人发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我的学生周泽章来告诉我这一情况。周泽章是周树清的儿子，我住在他家时，周树清要他去放牛，但他很想来读书，我去做周树清的工作，才被同意来读书，后来又让他到合面去读高小。合面高小的“三青团”组织要他参加“三青团”，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有啥不可以？只要不干坏事，有事跟我商量，我支持你！”我的想法是让他打进

去，给“三青团”安上一颗钉子，使我们能随时了解，掌握敌人的情况和动态。有天，我去赶场，周泽章跑来对我说：

“三青团”的区队长说：这个张老师，是个有本事的人，这样有才能，怎会跑到这儿来对这偏僻的山里感兴趣呢？我一看有问题？他怀疑你是异党分子！”我将这一情况及时向廖林生汇报，廖林生要我立即转移，他说：“我们的活动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稍不留心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随即他就安排我转移到荣昌去了。

我第二次到纳溪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廖林生要我回纳溪组织武装。本来川东临时工委决定在华莹山、荣昌一带进行武装暴动，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华莹山暴动遭到敌人残酷镇压，荣昌的一位区委付书记被捕牺牲。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我们又尚未准备就绪，不能立即暴动。因此川东临时工委决定：“四川的武装斗争重点转向川南，并指示川南工委迅速将武装斗争搞起来”。这样，由荣昌县地下党组的负责人周平和我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带了一部份干部身藏武器由江津分两路出发，来到合面汇合。这时合面已有一部份党员和群众骨干，他们分别来自大石、墩梓、一碗水等地，因为袭击了地主庄院，处决了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王龙骧后暴露，转移到合面来隐蔽的。我们一合起来就成为一支武装力量。廖林生召集了周平、余文涵和我在黎有章家里开会，研究怎样建立武工队从而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作了仔细的分析：一九四八年正处于解放战争的紧张阶段，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调往前线，我们在后方搞武装，是敌人的一块心病，会牵制住敌人的一部份力量，赤水、古蔺、叙永、纳溪等地的地下党员多，更由于多年来的

斗争事实教育了人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我们的武装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许多乡、保长都成了我们的统战关系；这些地区都是大山区，有宽阔的活动地方，敌人不容易摸清我们的活动规律。最后决定：根据华莹山失败的教训，先组成一支二、三十人的短小精干的队伍，暂不打共产党的旗号，以“跳滩”队伍（绿林武装）的面目出现，在川黔交界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叙永、古蔺、赤水作为活动地区，纳溪作为供应人力、物资的大后方，看准敌人的弱点狠狠打击，然后立即撤走。在深山密林里，我们能分能合，与敌人周旋。方案一决定，我们就组织人员进行武装训练，教大家使枪，练习打靶。

一九四八年秋正处于革命高潮，合面地区党组织已扩大，成立了独立区，包括江安、叙永、古宋的一些边沿地区，由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直接分管，黎有章作书记，欧志修、温敬涛作委员。我们这部份外地来的同志，这期间不准到街上去抛头露面，在农村进行军事训练，帮助当地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培养骨干，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我初次到合面培养的周树清、周五兴、周泽章、黎文辉、韩国民等一批积极分子，经过锻炼成熟，已先后被我或其他同志介绍入党。特别是黎文辉同志入党后，被组织上派到川滇黔公路要隘——上马场去开辟工作，最初那里没有党员，他去后通过物色、培养、教育、提高觉悟后，发展了韩均明，以后又发展了梁家的几个人入党，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建立了上马场支部，我曾到上马场吸收过党员。在合面有两个红色的“据点”，一个是新屋基的黎有章，一个是荷包丘周树清家，我们在那里可以放心进行训练，他们会自觉地为

们站岗放哨，周围住的都是党员和赤色群众。我记得周树清的小儿子只有十来岁，我们到他家开会，他带着狗去给我们放哨。

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各方面的条件基础准备就绪后，便开到川黔边境，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在叙永县的三门桥由川南工委的周平同志代表上级组织宣布成立川南武工队，我任队长，接着调来石建维任政委。这支小小的武工队活跃在川黔边境以后，敌人吓得要命。这年冬，我们便遭到叙永、古蔺、赤水三县敌人的围剿，由于我们在群众中建立了情报网，事先便得到了消息由周平和石建维带一部份队伍朝古蔺方向，我带一部份队伍向纳溪方向，分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扑了个空，这样，我第三次来到了纳溪。

我把队伍带到纳溪文昌宫，改变了武装斗争的方式，武工队不集中，将武工队员们分散到群众家里，帮助当地党组织训练武装人员或打入乡、保武装内部。当时上级指示我们要“三抓”，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合面的党组织已改为独立区工委，书记是黎有章，委员温敬涛、陈伯纯、许敬先、刘平、欧志修、黎汝楫。独立区领导下的几个边委，其中合面、上马、文昌一带叫江、纳、叙边委，刘平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周泽章任宣传委员，下面有上马、文昌、新屋基、大风垭、平屋头、猫窝窝等六个支部。我在第二次来纳溪发展的党员，有的已成为党的骨干了。在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时，我们注意了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组织学习党章、党纲，提高党员觉悟，对不符合条件的党员就清洗出党。我们在抓政权方面是利用选派人打

入乡、保、甲内部，发展党员。黎有章就是被选为保长的，最初他不愿意干，廖林生跟他做了一阵工作他才同意，但当了一阵就不干了；吴大甫也是当保长时发展为党员的。合面乡长朱西门、付乡长简承襄这些人，也成了我们的统战关系，不会危害我们。我们在乡公所有耳目，在保上有人通风报信，敌人有啥动向我们都清清楚楚。如象抗丁，最初是躲丁，派到那个人，自己人就通知他赶快躲起来，躲不脱就硬抗，合面场上就发生过几次抗丁打架的事。抓壮丁的抓到我们的人，住在街上的曹蜀华、王云堂等几个党员喊一些群众来打，结果就打脱了。抓到了政权，乡、保武装也就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了，保长、保队附是我们的人，手里拿枪的乡丁、保民兵是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的时候就连人带枪一起拖出来。进行武装训练有的枪就是拿保上的枪来用的。控制在我们手里的枪当时约有两百条左右，另外也买了三十多条枪，有的放在黎希贤的草房里，有的放在桂元山家里，用时就去拿。在一九四九年，我们还想拖出来干，但上级通知我们停止搞武装暴动。主要是川南距解放区远，搞武装暴动得不到解放区的支援；况且搞武装，弹药也不容易，组织不好会象华莹山那样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解放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地方党组织要积蓄力量，保存实力，迎接解放。我们的武装就转入了护桥、护路，防止敌人狗急跳墙，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临解放前夕，党组织调我到贵州毕节，做迎接解放的准备，我就再度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先后三次到纳溪，为党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这全靠党的教育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我

们地下党的同志，遵照党的指示，自己想法谋生、立足，千方百计地开展工作，坚决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地下党在白区的工作，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同样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有的经不起艰苦和危险的考验，图谋私利的人，成了可耻的叛徒。现在，党的十二大为我们制定了宏伟的战略目标，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这要求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不能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丢。我们几代革命者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一代一代传下去，一定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四川省会警察局起义前后

赵 斐 亚

编 者 按

赵斐亚先生，纳溪溪白合乡人氏，早年参加过进步组织，为革命作过一些工作。成都解放前夕，组织省会警察局起义。解放后，历经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作为成都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处理，先后担任纳溪县政协二届委员，泸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担任本刊编辑，一九八七年五月逝世。

赵先生病故后，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篇作品，其内容虽系叙述起义情况，但对研究省会警察局和其它有关史料，有一定的参改价值，特此发表，以飨读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重庆与军统特务头目何隆庆邂逅。我与何在三十年代是患难之交，久别相逢，格外亲切。这时何隆庆的公开职务是交警第一旅长兼四川省会警察局长。我这时在垫江县政府任秘书，何为了报答昔日恩情，邀我去成都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成都解放前夕，何隆庆飞逃台湾，我利用掌握警局实权的机会，组织起义，将省警局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为了便于叙述这段历史，将有关情况先交待一下。

一、省警察局组织机构和人事编制

解放前夕，省警局的编制是：局长一人，由交通司中将司令兼交警第一旅长何隆庆调充兼任。付局长一人，由交警第一旅付旅长李范章调任。下设四个室、六个科。四个室是：秘书室，主任秘书一人，助理秘书二人，人事、收发、电务、监印、雇员等共十八人；会计室，主任会计一人，会计员六人，助理会计和办事员等约十五人；车务室，主任一人，事务管理员、办事员共十二人，管理车辆登记、执照、违规事宜；调查室，正付主任各一人，调查员二十四人，分内勤、外勤两个组。内勤组管情报编审、收发密电、外勤组搞情报收集，除一般有关警务情报外，另负有军事、政治、经济重大情报的特殊任务，系军统、中统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

六个科是：总务科、外事科、警政科、卫生科、户政科、司法科。各科科长一人，股长三人或二人，科员、办事员十多人。其中总务科二十人，管出纳、械弹、被服；外事科十人，管接见外宾、对外联系等；警政科十八人，管消防、治安、交通；卫生科有医生、护士、事务员等二十二，管防疫、清洁、环境等、户政科十六人，管出生、死亡、迁徙；司法科增设付科长一人，审讯分民事、刑事两股，有股长、科员、办事员等二十四人，下辖一个法警队，队长一人，法警三十人。

督察处，正付督察长各一人，督察员三十至四十人，分为一、二、三等。

保警大队，正付大队长各一人，大队附二人。辖三个中

队，每中队三个分队。共有中队长三人，中队附三人，分队长九人。每中队队警一百五十人，枪一百五十支，每支配弹一百发。其中第一中队为美式装备，有卡兵枪一百支，可耳提三十支，手提式冲锋枪四支，快慢机手枪十六支。每支配弹二百发。二、三中队队员配用汉阳造步枪。官警共约五百一十名。

侦缉大队，正付大队长各一人，大队附一人，辖三个中队，九个分队。中队长、中队附六人，分队长九人。每中队队员九十名，每分队三十名。全系便衣，武器一律短枪，官警共约三百人。

刑警大队，正付大队长各一人，大队附一人，官警共约三百多名，人员武器编制与侦缉大队相同。所不同的是刑警执行任务时，须穿警察服装，公开行动，以重官仪。

消防大队、大队长一人，经常保持队员三百二十名左右。依据不同时期的消防工具设备，如水枪、水龙、火钩、灭火器，救火车等情况，进行编制组队。平时认真训练演习，临时灵活指挥，视情况缓急，可随时调动指挥街道消防队，共同战斗。

看守所，设所长一人，管理员、看守等二十六人，经常拘留有人犯二百至三百左右。

省警总局下辖十三个分局，每分局分局长一人，局员二人，干事六人，办事员、雇员六人。分管户籍、卫生、警政、消防、司法、总务事宜人。每分局下设三个（或两个）派出所，所长一人，巡官二人，警长警士三十六人。每分局和派出所共约武警一百二十名，枪一百支、弹一万五千发。武警除配各派出所执勤外，分局控制留

用约二十名左右。十三个分局共有警员（官）二百人，武警一千六百六十名，共辖三十七个派出所（其中有两个分局各只辖两个派出所）。

二、何隆庆与李范章

察局内部，人事复杂，派系繁多，思想混乱，斗争激烈，矛盾尖锐。局长何隆庆同副局长李范章之间，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自为奸。当一九四九年十月，刘邓大军挺进西南，贺龙司令员进军川西北的时候，成都形势紧张，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熊克武等暗中对反蒋有所活动。省主席王陵基是拥蒋的死硬派，打算要把分驻各县的二十个保安团，调到成都，集中武力，负隅顽抗，必要时摧毁刘文辉的部队，退距西康。经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向王陵基策划，调交警第一旅长何隆庆到成都兼省会警察局长，又签请国防部批准补充美械装备警察，同时将成都中央军校剩余部份汉造步枪和弹药，一并赠送警局，一方面为增强镇压力量，另方面是监视杂牌部队，特别是对熊克武等行动，严密监视，要求随时将川康将领活动情况上报。交警旅辖三个总队，全系美械装备。每总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共计约有四千五百人。但第三总队是新成立的，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起初何隆庆计划，把全部队伍调集省垣训练，以资掌握。因时局变化很快，田动云总队拖到筠连暴动去了。另一总队被解放军击溃，未能如愿。何隆庆同毛人凤是乾亲家，私人关系极为密切。戴笠死后，何隆庆是黄浦四期生，资格较高，又是蒋介石的学生，所以成了毛人凤的支柱，二人狼狈为奸。毛的初衷本想何留在大陆，同王陵

基合力，保存实力，以为根本；李范章是交警旅的副旅长，同属军统特务人员，兼省警局副局长，是何隆庆向王陵基推荐的。何隆庆提前已把家眷子女送往台湾，蓄意逃离大陆，只恐临阵脱逃，不好交待。所以利用李范章作替身，日后便于向台湾当局推卸责任，这是取得毛人凤默许的。李范章利欲熏心，升官心切，但手上没有实力，作副职又无实权，当何隆庆未走以前，李范章是极力主张武装逃难，拖队伍上山打游击的，并于十一月中旬，在警局内部筹划组织一个“战斗总队”，自任总队长，副总队长以交警大队长廖社翘充任，下设若干战斗大队，诸如参谋长、副官长、政治部主任等，都委派了人。部分官员是警局人员自愿参加，另有部分官员是外部落伍军官和失意政客或亡命特务凑合，如老牌特务曾任武汉警察局长的东方白也参加该总队担任高参。武器来源是想把成都军校赠送警局的几百支汉造步枪作基础，军校留蓉部分官员，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方面又派警到四门车站，检查汽车，遇有来历不明或无行驶执照的汽车，一律予以扣留，至十二月初，先后已扣留卡本四十余辆，轿车四辆，这批车辆，就是“战斗总队”准备撤出成都时，以作运送物资和械弹工具的。

十一月中旬，王缙绪在川西地区以“四川救国军总司令”名义，招兵买马，大肆活动。李范章野心勃勃，同王联系，奉委为该部“第一军军长”李据此封官许愿，又委派了一批师旅团长。当时，王缙绪用红布制了一种臂章，黑字用“治总”二字，代表王“治”意“总”司令的符号。在成都未解放前，这种臂章是反共的标志，同国民党军队，立场一致，通行无阻。随后十二月中旬，胡宗南、盛文部撤出成都